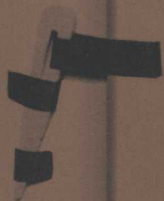


六ノ外

4



藏书家

第4辑

藏书家

齐鲁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书家.第4辑/齐鲁书社编.—济南:齐鲁书社,
2001.9

ISBN 7-5333-0986-3

I. 藏... II. 齐... III. 藏书—文集 IV. G25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2434 号

藏书家·第4辑

本社编

出版发行	齐鲁书社
社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邮 编	250001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张	5.125
字 数	112 千
版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4000
标准书号	ISBN 7-5333-0986-3/Z·120
	定价:8.00 元

封面题签 顾廷龙

责任编辑 周 晶

封面设计 韩济平

版式设计 李 生

目 录

藏界论坛

- 1 林 夕 藏书家的眼光

书林一叶

- 14 孙启治 跋经韵楼初印本《说文段注》

雪泥鸿爪

- 16 周清澍 谈弢翁藏书
——致周一良先生函

- 24 韦明铤 沧桑测海楼

- 32 童银舫 沈德寿与抱经楼

- 36 柳和城 台湾彰化吕氏藏书楼

- 39 止 水 南京书事(一)

- 48 王稼句 苏州书坊旧观

书海披沙

- 54 黄永年 忆世界书局的连环画

- 57 刘玉才 苏武气节故国情
——记韩藏抄本《皇朝遗民录》

- 63 姜青青 《方輿考证》的一波三折

68 苏 迅 把卷何妨影印本

73 段 华 孙犁的十本书

79 郁 土 网上得来的书

83 荆 帆 并州书缘

版本谈故

89 张景枬 张旻 杨守敬旧藏日本卷子本目录

109 张弦生 《歧路灯》：从手抄到出版

116 辛德勇 卖书人徐元勋

123 李际宁 日本的古寺与古经
——访京都大德寺和名古屋七寺

131 谢其章 《中国画报史》猜想

书海浪花

137 宁荫棠 百年藏板重现记

藏家写真

143 杜泽逊 长伴蠹鱼老布衣
——记藏书家张景枬先生

新著快读

151 万 宇 一种清闲谁领得，满阶梧叶尽秋声
——《黄丕烈评传》解读

157 编后记

藏书家的眼光

林 夕

藏书家有五等

要 讲藏书家的眼光，首先要看藏书的目的。藏书的目的不同，眼光也就不会完全相同。说起藏书的目的，我们都会想起清代洪亮吉。他的《北江诗话》曾经把藏书家分为五等，五等人藏书的目的各有不同。用现在的话简单地说，他所分的五等人中，考订家应该是研究学术，校雠家是整理古籍。收藏家不大好定性，是不是多少有些类似图书馆呢？至于赏鉴家是玩赏古书，掠贩家是买卖古书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洪亮吉的分等和命名有很明显的褒贬，今天大可不去理会，然而他的观点却很有代表性。我们知道，清末著名学者李慈铭读书少所许可，动辄批驳指摘。他的日记对《北江诗话》也不认可，说作者不是诗家，评论大都不准确。然而他却完全赞同洪对藏书家的评论，说“其言是为藏书家定

评”。可见这五种人还是客观存在的，只是我们不能过分抑扬就是了。我们不妨看看这五种人对藏书有可能持什么态度。

如果买书是为了研究学术，对版本就可能不多考究。说到这里，不免想起清末陈其元在《庸闲斋笔记》中讲的一个故事。王定安买到宋刻《孟子》，向他夸耀。他想看看，王叫人扛出一个柜子，柜子里面装着一个木匣，打开匣子才见到书。陈其元一看，笔画跟通行本没有什么不同，就问读这部书能增长智慧不能，王说不能；又问能多记几行不能，王说也不能。陈笑了，说那就不如还读通行本，何必花上百倍的钱买它呢。王很气恼，说你不懂，没法跟你欣赏，马上把书收起来。陈其元大笑而去。

这真像个笑话，写得活龙活现，奚落之意溢于言表。不过近代著名目录版本学者王大隆先生就不以陈为然，说陈其元连眼睛也不大管用，宋本字体端浑，一看就应该发现清刻读本不能相比。他认为王定安怕是古董家数，没有好好看看这部书，人家一问，他什么也说不上来。要是认真比较比较，宋本文字有许多佳胜之处，远非通行本所及。稍稍举几个例子，陈就得哑口无言。

陈其元虽然是读书人，而且著书立说，但是要他赏识版本的差异，恐怕要求高了一些。李慈铭看了陈其元的《庸闲斋笔记》没有好话，说他“太不读书，叙次亦拙”，“间及考据，无不舛谬”，不值得纠正。其实今天的读书人也不一样，有人也是有个本子看就行，不讲究版本。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可以只用现在的新印本，不看线装书，文章照样写得很潇洒。

整理古籍情况就不同，功夫全在校勘。比较不同版本的差异，决定异文的取舍，这是校勘的基本功。王大隆对陈其元的故

事有不同看法,原因就是精于校勘之学,深知版本的重要性。清代著名学者顾千里家道不裕,不可能以藏书名家。但是他一生为衣食奔走,经常代他人校刊书籍,深知读书和校书不能不讲究版本,一有机会就搜集旧书善本。好书无钱不能到手,即使到手也得转让,只能留一个传校本或过录本。结果在叶昌炽的《藏书纪事诗》中,他也占有了一席之地。他批评读书不讲究版本,在《蔡中郎文集跋》中说:“书以弥古为弥善,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。乃世间有一等人,必谓书无庸讲本子。噫!将自欺耶?将欺人耶?”

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叶德辉也很重视版本,有朋友跟他说自己平生不知道什么版本,只要看见书上有字就读。叶就打趣,说他读的书都没有字。叶德辉的意思是,读书不讲究版本,书上错字连篇,有字等于没有字。叶德辉又藏书,又刻书,说这种玩笑话也很自然。

洪氏说收藏家是“搜采异本”,以鄞县范钦天一阁、钱塘吴焯瓶花斋、昆山徐乾学传是楼为代表。范氏确实以“购海内异本”闻名,而且收藏一些不被正统藏书家看重的史料文献,能买的买,不能买的就借来传抄,这倒是有些现代图书馆的作略,只是并不给外人看。范氏不仅收藏,而且刻过《天一阁奇书》。吴焯一生致力于搜集旧本秘册,而且亲自校书。他的《绣谷亭薰习录》为各书所作的提要说明,提纲挈领,原原本本,确有真知灼见,并非仅以收藏为能事。洪氏把他们归入收藏家,可能是因为他们藏书数量庞大,重在收集奇书异本,即使刻书校书,也跟专门研究学术和整理古籍不同。

同样是收藏古书,而且校书刻书,洪亮吉却把黄丕烈和鲍廷

博降了一等，归入赏鉴家。说他们“第求精本，独嗜宋刻”，即使作者的意思未能全懂，刻书年月却一清二楚，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是不以为然。洪氏帽厂制作的赏鉴家这顶帽子，黄、鲍二人都不是不能戴，却说不上尺寸多么合适。黄固然是“佞宋”出名，但是他不是不校书。我们在他的题跋中看到，他得到一个本子往往不等过夜，立即“挑灯”急校。他校书有所发现，欣喜若狂。已经过去了二百年之久，他的藏书题跋中蕴含的爱书如命的激情，还是那么深切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。他刻过许多著名的影宋精本，见到古书有残缺千方百计抄补，乐于为古书续命。说鲍廷博是赏鉴家就更不合适，他用毕生的精力校书和刻书，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工作性质应该属于整理古籍，水平高低另当别论。他抄书和校书出名，却没有听说他收藏多少宋本，“独嗜宋刻”的帽子也扣不上。

但是黄、鲍二人比起范、吴、徐来，却不能不说还是有差别。范钦是进士，做过兵部侍郎。吴焯有文名，清圣祖南下时献诗献赋，很有名气，著作也有十几种之多。徐乾学更是闻人显宦，康熙时名重一时，编书刻书更是当行。这都是饱学之士，即使洪亮吉对他们的藏书行径眼红或者腹诽，也不能说他们不读书，或者看不懂书。黄、鲍的名气和造诣不能跟他们相比，不妨加上“作者旨意纵未全窥”的帽子。

封建社会有等级观念，对人的评价跟他的家世、经历和从事的职业有很大关系。像范、吴、徐三人，洪氏都可以引为同调，黄、鲍他是不肯为伍的。尽管洪氏把收藏家列在考订和校讎之后排为三等，考语似乎也有保留，不过人家的地位和事业在那里，业馀搞搞收藏，玩物并未丧志，不便说闲话。那些地位不高

的赏鉴家以此为业，对他们就不必顾忌，说说他们不读书又何妨？说到掠贩家就更明显了，简直就是惟利是图，什么“眼别真贋，心知古今，闽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，宋槧元槧，见而即识”，不过是“掠贩”的资本而已，不能当好话听。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不高，洪氏这样讲不足为奇。即使在今天，口头上都讲人人平等，至于头脑中有没有尊卑贵贱的等级意识，口不言阿堵，也是你知我知的事情。

其实无论地位尊卑，人都是要做事情的，做事情的目的不外乎适意和谋生。要适意，就要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；要谋生，就要做赚钱的生意。考订和校讎也有这两重性质，不同的人可能偏重之处不同而已。纯粹收藏，只能说是适意，跟谋生无关。赏鉴家也应该是适意，从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中，我们只能看到他求书时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，几乎不计价就成交。像宋刻汤汉注《陶渊明诗集》，他惦念已久。流入市廛后，出四十两银子没有成交，已被别人买去。结果不得不请朋友说合，出至一百两才买到手，他知道别人听了要笑话，还是这样干，看来他并没有考虑出手可以赚多少钱。至于到晚年家境日见衰败，他去开滂喜园书籍铺，那是生计有了困难，不能不变卖家产度日，跟做买卖不是一个意思。

掠贩当然是谋生之道，不过这也未必就排斥适意。想当年王文进开文禄堂书店，那是地道的做买卖。但是他买进宋蜀刻珍本《庄子南华真经》以后，十分喜爱，卖给傅沅叔以后，睡梦中也念念不忘，竟至以“梦庄居士”为号。可见卖书的也不是不爱书，如果家有馀资，有些人很可能就是赏鉴、收藏，甚至校讎和考订。像陈乃乾先生本是书生，天性爱书，身非富家，为了多接触

古书,只好去开书店,后来投身古籍编纂出版事业,成为名人,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做买卖当然要贱买贵卖,只要不欺不骗,没有理由说长道短。只是买卖双方心情不一样,买东西的往外掏钱总会嫌贵,有些不情愿,读书人对卖书的免不了有意见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

用藏书家的眼光看书

藏书的目的不同,着眼点也就有所不同。不过书是读物,首先是有助于修身养性,明理经世,发挥社会效用。从古籍编目的顺序是经史子集,经排一,史排二,就可以看出各种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藏书家要提高身分,显示品位,即使不读书,也不能不置备上档次的书。书架上放的书,是主人的思想境界和社会地位的标志。科举时代读书考试以经学为主,《十三经》的分量是重中之重,藏书家不能不竞相追逐。其次是史书,官修正史是史部冠冕。一部藏书目录没有几部正经正史压阵脚,就不够身份。野记稗史还不妨藏一点,小说戏曲就难登大雅之堂。直到清末,社会逐渐转向实务,经学不像昔日那样专宠,李慈铭还是说“甲部为读书先务”,嫌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对经学各门所注太略,对读者指导不够。

二十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之后,治经已经不是登龙术,史学开始占据主流,学者思想活跃,过去不受重视的稗官杂记以及清代的禁毁书籍开始升温。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兴起以后,读书人的眼界更为广阔,过去很少涉足的领域一时成为热门。民国初年,古代金石器物等的拓片和图录,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作品,都曾成为学者热衷的收藏品。一些学者热爱版画艺术,

开始搜集画谱和带有版画的绣像本和插图本。在过去藏家眼里,这些东西大抵不入流,轻易不会收藏。即使家里有,也不能堂而皇之地写进目录,这是不能上目录的书。

从收藏的角度着眼,内容固然重要,却不如珍奇罕贵更为诱人。中国古籍大量印刷起于五代,兴于宋代,元明清顺流而下。判断珍罕与否的标准,眼睛首先放在年代是否久远上。宋代藏五代的书,明代藏宋代的书,都是上上的选择。我们看明人作假骗人,都是说伪造宋本,而不说造元本。

直到清初钱、毛、季、徐各大藏书家都是以宋本标榜,隔了朝代,元本自动升级。像季振宜有《延令宋板书目》,徐乾学有《传是楼宋元板书目》,钱曾的《述古堂书目》前面特意列出一卷《宋板书目》,都是这种眼光。这个风气一直延续,像嘉道间的赏鉴家黄丕烈,对元明本也不是不屑一顾,藏书处却以“百宋一廛”为名。

清末著名藏家所编的藏书目录都是以宋元为主,明本已经有所选择,大量清刻本一概摒弃在外。清末丁丙的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说得很具体,能进善本书行列,一是宋元旧刊,二是明嘉靖以前的刻本和明后期精本,三是明清名家抄本,四是清代名家批校本。丁丙是清末四大藏家之一,藏书质量非一般藏家所能企及,标准当然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古书一天天减少,一般藏家的尺度不能不放宽。像缪荃孙的善本标准划线到明末,一般抄本和批校本都算数,包括日本和高丽新旧刻本,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情况。

藏书家以年代区分版本高下,显然注重藏书是不是古老稀罕。但是一部书传本多寡并不完全决定于年代远近,即使年代

不久,如果印本不多,毁失严重,也可能难以见到。再加上学者更多地关心内容,看法自然就有所不同。对于清刻本一律排斥、抄本和批校不加甄别的做法,陈乃乾就颇有微词。他说这个标准对藏书家和旧书店有很大影响,结果清顺康以来的刻本无论刻得多么精善,传本如何难得,都不屑一顾,抄本不论内容如何都称善本,加几个藏章,写几行题跋,更可以卖高价,这纯粹是附庸风雅。

陈氏讲得当然有道理,不过这到底还是书生之见,并不可行。照他的办法,书善与非善,有无价值,收藏与否,都要对书的内容一一比勘,细细甄别,才能有结论,这岂是咄嗟可办的事情?一般人只能望洋兴叹,没有相当的学识,充裕的时间,根本无法下手。像郑振铎先生的《劫中得书记》说在书店看到一部《史外》抄本,拿回去放了几天,又买了一部刻本,花了一夜的工夫细细对校,发现抄本无可取之处,结果弃抄留刻。后来听说抄本卖了善价,还发了一番感慨,说买这种书的只是耳闻抄本可贵,不知道贵在哪里。像这种事情,今天的读书人是办不到了,哪一家书店也不会让你把书拿回去推敲一个够再拿回来。再说藏书毕竟要有财力,有钱才能买书,有学和有钱二者不可兼得,都指望望着够上考订家和校勘家水平的买书,书店非关门不可。郑先生可以随便换书,这还是因为他有能力大量买书,是书店的贵客,没有条件的哪里能这么办。

其实陈乃乾说的也不尽然,民国初年清代精刻本并不便宜,可见大家对它们并没有小看。像嘉道间胡克家、张敦仁、吴鼐、黄丕烈、汪士钟的一些书,大都出于顾千里之手,刻印讲究,校勘精审,售价几乎可以跟明代白棉纸佳本相比,远在一般明刻本之

上。其实清代私家刻书大抵是图名不图利,特别是名人刻书,校勘和刻印都不草草,印数也不会太多,流传到今天的就更少。有些清初刻本年久代远,或遭禁毁,或已散佚,至今已如凤毛麟角,甚至早已春归天上,绝迹人寰。嘉道刻本往往还来不及大量刷印,书版就损失于道咸战火之中,已有的印本历经天灾人祸,很难说能留下几本。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划线原则上在清乾隆,这是为了当时全国普查工作的便利,不能不规定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掌握的标准而已,并不是说其后的书就不珍罕。看看过去的行情就知道,康乾本不一定比嘉道本贵,关键还是要看到底是什么书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嘉庆吴鼐刻本《晏子》两册一般也在二十元以上,《韩非子》四册就要四十元,张敦仁刻的《盐铁论》三册三十元,平均一册都在十元上下。道光汪士钟影宋刻《仪礼疏》好的要卖到五十元以上,而乾隆内府古香斋刻《史记》开化纸三十六册,当时才卖二十五元。

如果硬要划一条线,那么清代顺康本和道光本珍品最多,其中大有极其难得甚至不见著录的东西,书店定价时也未必知情,很可能当普通书卖,有志于藏书者需要认真对待。随便举个例子,为了研究宋姜白石的十七首歌谱,我很久就想买清道光戴长庚的《律话》,不料多年寻觅竟然不见踪迹。直到近年,在苏州古籍书店遇到,承蒙几位先生好意,慨然允售,这才得偿夙愿。江澄波先生把书交给我时,也感慨地说:“贩书五十多年,仅见此一部。”而我也快找了四十年了。不过是个道光本而已,却是如此难得,一般人哪里想象得到。

像这样一些书,如今能在无意之中邂逅,那真是喜出望外的

缘分,一旦错过机会,很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。当然能在浩瀚的书海中做出准确的判断,这还要具备一定的经验和阅历,才能像李白当年在行伍之中援救获罪的郭子仪那样慧眼识英雄。这不像说话这么容易,一部书存世是多是少,即使在过去旧书店鳞次栉比、古书连屋累栋的时期,不在书海中泡上十年二十年,也摸不清底细。如今许多地方连旧书店都看不见,偶然有一家两家,也没有几本像样的线装书,积累经验谈何容易!这就要靠吸收前人的经验,充实自己的脑海。前人的书目题跋中时常讲古书各种版本的高下,存世数量的多少,时而还有一些趣事,很耐人读。这几年书目、题跋、书影特别畅销,出版社竞相出版,看来跟近几年兴起的藏书热有很大关系。

为藏书家论道

说起藏书热,不免想起1943年陈乃乾在《古今》杂志上连载《上海书林梦忆录》,对民国初年以来藏书的情况发了一通感慨。他说往日藏书的都是好书读书的人,得到一部书必定亲手点校,郑重收藏。书香之家,则传之子孙。而当时的藏书者是看到书价暴涨,有钱的人就群起争购,把书看做货物和资产,或者用来牟利、趸货,或者用来陈设厅堂。而真正能好书读书的人,反而无力买书。他说的都是实情,其实古书一旦退出历史舞台,数量一天天减少,也就一天天远离读书人而去。陈先生的感慨发得太早了,当时的读书人手里多少都有一些好书,也没有到整天为稻粱谋却连几部心爱的线装书也不敢买的地步。但是要说以书牟利,除非遇到非常时期,有意外的收获,否则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试看过去有不少人开古旧书店,日子也混得过去,

可是真正以此发家致富的有多少呢？陈乃乾是过来人，他曾说过贩书有许多特殊的难处，买卖也不好做。

我们说“非常时期”例外，抗战初起时，兵荒马乱，人们没有买书的心情，卖古书的摆摊、挑担叫卖，几乎是给钱就卖。五十年代初期社会变革，旧家富户的藏书纷纷涌出，有钱有心买书者寥寥，书店里的书论斤卖。在这等书跟蔬菜一样论斤买卖的时期，多么好的珍本秘籍也不值钱。我们知道，五十年代初，南京甘氏书散出，有人论斤买到至少几百年毫无所知的人间孤本宋刻《金石录》，一时传为佳话。我们也知道，在“文革”时期有从造纸厂里花几分钱换回稀世珍本的事情。1970年后古书店有一阵子开放，现在要卖一千元的书当时至多一块钱，在看惯几千几万几十万的拍卖会场的今天听起来，这简直跟笑话一样，哪里会有这等天方夜谭！在这些非常时期，只要你是有心人，有眼力，少买几棵大白菜，换成一堆书，今天多了不敢说，买汽车没问题。如果肯破费一个月的嚼裹儿，现在买一所房子还不是谈笑之间的事情？

从五十年代以后，昔日收藏古书的读书人和非读书人钱和闲都有问题，失去了热情，后继乏人，再加上书店有规定，有书优先供应单位，不大肯卖给私人，私人收藏线装古书的传统戛戛乎断绝矣。然而峰回路转，九十年代以来藏书一时成为时髦风尚，线装书时来运转，陡然走俏。各地拍卖会应运而起，一时好不热闹。出入此门者长者仅是偶见，中年是主力，最奇是连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是白棉、开化，宋元明清，雕版活字，张口即来。看到这种场面，不由使人纳闷：旧日传统的嫡传断绝几十年之后，如今再续香烟，从哪里下手呢？